

● 政治学

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境遇及其方法论原则

沈 壮 海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沈壮海(1971-),男,河南焦作人,武汉大学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摘 要] 世纪之交,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发展主题中的凸显、全球化浪潮的迅猛涌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等现实境遇,昭示着当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也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依藉的科学方法论原则的确立提出了具体要求。在当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承继传统,广泛吸收,植根实践,综合创新。

[关键词] 文化建设;现实境遇;社会主义;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D 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5-0600-05

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经济、政治作为统一的建设目标,并为之奋斗,是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我们建设实际中的具体体现。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基于对这一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强调,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的科学命题,并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的有机统一概括为党在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江泽民的这些论述,精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整个建设事业中重要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在中华民族正致力于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推向前进的时刻,深刻领会江泽民概括的这一最主要的经验,剖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面临的现实境遇,探讨其方法论原则,建设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促进其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和谐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向 21 世纪的过程中所客观表呈着的各种矛盾运动,也勾勒着我国当前文化建设所面临的现实境遇。任何现实境遇,都对运动于其中的事物的发展具有影响意义与具体规定性。正视“世纪之交”这一独特的现实境遇,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得以深入展开的前提,也只有通过对这一宏阔背景的审析,我们才更有可能体味到当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凸显出的极端重要性与紧迫性。

(一)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已成为发展主题中的重要内容

如果说,在数十年前,人类还更多地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当下的发展观,则以其对文化建设问题的突出关注,标显出时代的特色。人是文化的存在物,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文化也无异于是社会的各种物质骨骼的纽带及人类社会进步的牵引力。文化建设问题,在当下发展观中的凸显,是人类对自身作为文化的存在物这一根本角色的认识上的自觉,也是人类在回应、反思 20 世纪社会运作实态的过程中作出的一种战略性抉择。一方面,自 20 世纪初起,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文化的危机,寻找精神文化的支撑,愈益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越来越

越响的呼声。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诸多的原因,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挫折。这一变动,对原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人们而言,无疑也是一种精神文化方面的惊震,对其固有文化观念体系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冲击。再者,20世纪科学技术革命高潮的持续涌起,对个体文化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在科学工具理性高涨的同时更加关注人生的终极价值与人文命运问题。另外,科学技术的发展,愈来愈强化着人对自然的驾驭能力,扩张着人类向自然索取的胃口,也由此愈加鲜明地将人类与自然推置到了对立的境地,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成为世纪之交突出的全球性课题。这些问题的出现,直接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与繁衍构成威胁,粉碎了人们在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建构的恒等式,使人们开始关注精神文化与发展之间的深层关系。综而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发展、社会主义面临的现实挑战、科技革命大潮的持涨、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等,从不同的角度,将人本身的价值与命运、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课题,以更为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得文化问题成为世纪之交人们关注的焦点,文化建设成为世纪之交发展主题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世纪之交,文化建设问题在发展主题中的凸显,还有一层重要的原因,即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国家政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化作为综合国力、作为国家竞争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从而从国家竞争战略的角度出发来关注文化建设。弗朗西斯·福山发表的《信任》一书提出,在当今世界,决定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已转移为由文化所建构的社会信任与合作。托夫勒认为,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将不再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主要指标,知识的控制是明日世界争夺权力的焦点,谁家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就是国际权力斗争的赢家。约瑟夫·奈也指出,在当今世界,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别国就会自动地向它靠拢,倘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这些论调,虽然含有文化史观的成分,但却为文化建设成为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强化官方对文化建设重要价值认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种现实境遇之中,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升综合国力,无疑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一项急迫任务。

(二) 全球化浪潮迅猛涌来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已毫无疑问地将人类社会推置到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在人类社会所掀起的最大浪潮,莫过于“全球化”。全球化在文化方面的

具体表现,即不同文化间的交汇和碰撞在频度、深度、广度诸方面的扩展。任何文化体系,只有在开放的状态中,通过有规律的吐纳运作,才能完成自身的新陈代谢,维持体系生命力的延存。因此,全球化浪潮的涌起,以其对不同文化体系间汇遇、碰撞运动的推助而具有促进参与了这种碰撞运动的所有文化体系吸纳异质文化、得以丰富发展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全球化浪潮的涌起,对一定的文化体系而言也具有消极的影响。这是因为,在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碰撞中,总是高势位文化掌握交流、吸纳的主控权。这种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决定了现实文化交流的不平等性。当今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便具有鲜明的不平等性,表现出不平等的输出和接受关系。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和先进的科学力量为依托,把持着文化交流中的主动权,控制着文化交流中的流量、流速、流向乃至所传递的文化信息的性质。文化交流中不平等性的进一步发展,便是文化领域中的殖民与被殖民。文化殖民,态度温和甚至友善,手法灵活且多变,潜移默化却最具渗化效力,具有极大现实危害性。在上述文化交汇的大态势下,我国也客观地处于文化交流中的劣势地位,这种劣势地位,使得我们在改革开放、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时时难避苍蝇蚊子之类的叮扰。有关学者惊呼“警惕殖民文化”,其因即在于此。一些美国学者发出“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是自信危机,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中国性”之类的感叹,虽有过分夸大之嫌,但却并非毫无根据。全球化浪潮迅猛涌来,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境遇,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言,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回应挑战的惟一出路,正在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才有正确、有力的判断、选择、吸纳、消化机制以及防御、调整、净化机制。为此,我们也须加强社会经济、科技建设,以综合力量提升我们文化在整个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势位,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具有更大主动性与主控性,吸纳精华,磅礴发展。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推进

我国当前的建设实践,无疑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基本境遇。在当前,我们正借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实践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最基本、普遍的心理层面出发,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如市场经济所孕发

的平等、民主意识以及契约、法制、效率观念等,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有积极作用。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毕竟也有市场经济的一般属性,会滋发诸种不良的社会心态,如等价交换的原则,会将一切具有有用性的东西都卷入市场,乃至将良心、肉体、权力等都点化为商品,又如利益驱动,会使各种社会角色所应有的操守与职能被扭曲^[1](第 7 页)。要将这种负面的影响限制到最小程度,需要我们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另一方面,文化与经济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在看到来自市场经济的确立对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冲击与推动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文化的发展对市场经济的推进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的运作必然需要社会通过文化的层面确立法制体系与法制精神;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这也需要介入市场经济的不同主体都有从心理观念层面到知识技能层面的竞争素质,等等。诸如此类,都是市场经济的良性运作对文化的要求,也是文化所应为市场经济的运作发挥的功能。因此,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文化在市场经济诸层面的冲击下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内在必需,也是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我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之中。在世纪之交的今日,我国现代化建设已进入关键时期。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2](第 775 页)。如果一个民族缺乏一种能赋予现代化的制度和管理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人的素质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邓小平多次述及。他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3](第 120 页)。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也明确强调:“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文化是人的创制,而人又是文化的塑造,现代化的人,就根本而言,就是由现代文化武装起来的人。因此,实现人的现代化,推进我国现代化的整个进程,也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紧迫要求。

二

综上所述,我们初步分析了世纪之交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面临的现实境遇。这种现实境遇,鲜明地凸现着当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那么,我们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该坚持怎样的方法论原则呢?

(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近些年来,在文化建设方面,一些人鼓吹要“消解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还有个别人鼓吹以儒学代替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为中华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找到一个安顿处与立足点,马克思主义既不能体现民族生命,又不能代表民族精神,为此,儒学应取代马克思主义,恢复历史上的崇高地位,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这些人的根本目的之一,便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对于这些错误的论调,必须予以严正的驳斥。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作为对人类社会客观规律予以正确揭示的科学体系,具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意义,是我们一切事业必须依藉的理论武器。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一切建设事业的指导,是历史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了的基本结论。文化与意识形态虽不完全叠重,但在任何时候,意识形态都始终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所在,是不同文化呈现自身特色的根本标志,它赋予文化以各自相应的性质。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就无法保证所要建设的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二战后全球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这种论调,人为地将文化与意识形态剥离,实质上隐含着以文化冲突来掩盖意识形态渗透的企图。从另一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在任何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归根到底都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文化,任何统治阶级所坚持的思想文化建设,都只能是维护本阶级利益、有益于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否定无产阶级自身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必然会最终导致自身政治领导权的丧失。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指出,资产阶级掌握政治、文化两种领导权,文化领导权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更强有力的堡垒。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同样如此。苏联生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在于否定马

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丧失了文化建设方面的领导权。

(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是基于传统的创造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直接延续。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创造了悠久的传统,也提供了我们今天继续创造的起点。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的历史”,我们目前所具备的一切,“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也不是从现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本质上原来就具有的一种遗产,确切点说,乃是一种工作的成果——人类所有过去各时代工作的成果”^[4](第7-8页)。抛弃传统,否定前人的成果,永远只能是原地踏步、从零开始,这便既无前进,亦无历史的延续。

基于传统,不等于沉迷于传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基于传统的创造,是对传统的提升、超越与发展,不是以迷恋传统为基本态度的向传统的简单复归,或对传统不加分辨地简单复活。近些年来,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学术层面上有相当程度的滋蔓;在大众世俗层面上,则有封建迷信文化的浮现。他们或视儒家文化的复兴为中华文明崛起、中华民族强盛的必经之途而主张复兴儒学,或假借继承传统的口号而别有用心地肆吹封建腐朽文化的迷雾。凡此种种,都是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对待传统的正确态度迥然相悖的。

在继承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苏联有过教训。在我国,除了前文述及的个别人盲目主张以儒家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制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等错误言行之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存在另一些误区。如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西方文化,视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以西方文化为主导;一些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作为两种对等的文化,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视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两种文化的融合,与中国历史上汉代儒佛的融合、明清时期儒耶的融合相提并论等等。这些认识误区,同样具有相当的现实危害性。前者会成为西化论的理论依据,后者则会进一步从前两次文化碰撞中儒家文化对释、耶文化的涵化为历史事实依据推导出传统文化涵化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最终同样走上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歧途。我们应认识到,其一,马克思主义不等于西方文化。它是世界无产阶级共有的理论和学

说,且在马克思主义中,本身便含有中国人民的智慧创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便是作为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所取得的理论精华,打烙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而溶入马克思主义,构成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的。其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是指导思想,是“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是“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一个是具体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包含着与中国的文化实际相结合,自然,也包含着与作为现阶段中国文化建设起点的客观存在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这种结合,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两种文化的混加与调汇,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衡估,遗弃糟粕,撷取精华,从而服务于整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需要面向世界,广泛吸纳一切民族先进的文明成果。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我们对整个世界做出过杰出的文化贡献,但并不能因此而自大,闭门自足;我们要警惕文化殖民主义,防止文化病毒的侵袭,但也不能因此而畏惧,闭门自守。自足与自守,都是一种自我封闭主义。自我封闭,只能是自己截断吸纳营养的管脉,轻则营养不良,重则枯萎,再么就是成为温室中纤嫩的枝芽,见不得半点风霜。其实,在当今世界,在全球化浪潮迅猛涌起的客观境遇中,自我封闭已成为一种不可能。在劲风狂澜中,腾起的往往是主动凌空振翅者,飘摇坠落的,只会是闭翅畏缩者。在世纪之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需要我们以自觉能动的主体精神,广纳博采,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还有一个抵制的问题。早在1983年,邓小平便指出:“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为什么在文化范围的交流,反倒可以让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呢?……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3](第43-44页)。在当前,由于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文化发展,文化交流中的个体化成分愈发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吸收优秀外来文化的同时,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正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

(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在文化建设问题上,我国自近代以来便有激烈的论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互为体用、西体西用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主张的共同缺憾之一,便在于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实践在文化发展中的根本作用,而只在移植与拼接的层面上来探讨文化发展的路径。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归根到底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实践是文化发展最根本的源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只能矗立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强调我们的文化建设必须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还因为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国特色赖以标显的基石。文化特色源于实践特色,因实践活动主体及其所处的时域不同,实践特色又通过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两个方面得以表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国特色,便是与当前中华民族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对应的时代特色与民族特色的总和。将中国特色等同于时代特色,会忽略“我”,忽略中国文化建设实践的主体,丧失吸纳消化外来文化的主体尺度,丧失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将中国特色等同于民族特色,则会忽略当前我们文化建设所处的具体历史时空,容易导致文化建设上的关门自守、全面复古,亦产生不了我们当今所谓的中国特色。只有植根于现时代的中华民族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因应时代主潮,彰显民族特性,我们

的文化建设才会以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放出异彩。我们强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还在于只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才是我们大胆继承、广泛吸收、综合创新的结合点。如前所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离不开对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但吸收和借鉴,必须以有利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推进为依据,必须在这一伟大实践中进行改造和提升,从而将其转换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有益成分。离开实践,既难以化古为今,又难以化洋为中,古今中洋的简单混杂,只是拼盘,不是综合创新,也产生不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其实现的基点正在于现实的中华民族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

参 考 文 献

- [1] 李景源.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基础[J].哲学研究,1996,(11).
- [2]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责任编辑 叶娟丽)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 Circumstances and Methodology

SHEN Zhuang-hai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SHEN Zhuang-hai (1971-), male, Doctor, Lecturer,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joring in Marxist theory and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Abstract At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centuries, as cultural construction becom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 subjects, the background circumstances of the ever-rising tide of globalization ever-developing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give rise to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urgent need to construct 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 It also makes specific requirements for the founding of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ethodology on which the socialist culture construction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 is based. Therefore, the current socialist culture construction should take Marxism as its guideline, carry forward the good tradition, draw from advanced foreign cultural achievements, resort to practices, and make innovations in a comprehensive way.

Key words culture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circumstance; socialism; methodology